

青島高等教育史

现代卷

顾问：胡延森 徐建培 夏临华
主编：刘增人 王焕良
撰稿：王今晖 田广渠 于佐臣
时桂山 周晓莉 耿宝福



人民出版社

青岛大学资助出版

青岛高等教育史

现代卷

顾问：胡延森 徐建培 夏临华
主编：刘增人 王焕良
撰稿：王今晖 田广渠 于佐臣
时桂山 周晓莉 耿宝福



人民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鲁 静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鸣 羽

责任校对:孟 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岛高等教育史(现代卷)/刘增人 王焕良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01-007206-7

I. 青… II. ①刘… ②王… III. 高等教育-教育史-青岛市-现代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994 号

青岛高等教育史

QINGDAO GAODENG JIAOYU SHI

(现代卷)

刘增人 王焕良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75 千字 印数:3000 册

ISBN 978-7-01-007206-7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青岛高等教育体制的奠基: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时期 (1905—1924年)	(1)
第一节 清朝末期和德国侵占初期的青岛教育	(3)
一、县学、书院、卫学、学塾为一体的传统封建教育体制	(4)
二、教会学校的创办	(6)
三、新式学堂初创	(7)
四、职业教育兴起	(9)
五、同盟会在青岛的办学活动	(10)
第二节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创办	(12)
一、殖民地经济与社会形态	(13)
二、“独立的文化政策”的出台	(15)
三、建立“华人学校的计划”	(19)
四、中德合办“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谈判	(23)
五、商定《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	(25)
第三节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办学模式	(26)
一、校址与校产	(27)
二、科系与级次	(29)
三、生源与师资	(33)
第四节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教育理念及其影响	(41)
第五节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闭校后的青岛教育	(46)

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国人、民间办学模式:私立青岛大学时期

(1924—1929年) (52)

第一节 青岛收回前后的社会环境 (52)

第二节 社会各界筹备私立青岛大学 (54)

第三节 中国人在青岛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开学 (56)

第四节 私立青岛大学的曲折发展 (60)

第五节 私立青岛大学被迫停办 (67)

第三章 高等教育的名校名师模式的创办:国立青岛大学时期

(1930—1932年) (70)

第一节 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建 (71)

一、选址青岛筹措办学 (71)

二、功勋校长——杨振声 (75)

第二节 院系行政设置与场馆建设 (80)

一、院系设置 (80)

二、行政设置与经费来源 (81)

三、图书馆和体育场建设 (84)

第三节 各院系课程建设 (90)

第四节 魅力青岛 名师荟萃 (101)

一、闻一多、梁实秋与沈从文 (103)

二、黄际遇、汤腾汉与傅鹰 (108)

第五节 学生录取与《学则》的颁布 (114)

一、学生来源与录取 (114)

二、《学则》的颁布 (117)

第六节 教学独具特色 科研稳步提高 (127)

一、教学特色鲜明 (128)

二、科研稳步提高 (130)

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132)

一、校园内的学术活动 (132)

二、校园内外的文体活动 (134)

第八节 两年三次罢课斗争 (136)

一、初次罢课 学运序曲	(137)
二、南京请愿 要求抗日	(137)
三、反对学则 驱逐教授	(140)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名校名师模式的延续:国立山东大学时期 (1932—1937年)	(143)
第一节 两任校长	(144)
一、赵太侔校长	(144)
二、林济青校长	(147)
第二节 院系行政机构调整与场馆建设	(147)
一、院系调整	(147)
二、行政机构调整与经费来源	(148)
三、场馆、设备建设	(150)
第三节 院系发展与课程设置	(155)
一、文理学院	(155)
二、工学院	(165)
第四节 教师队伍的充实和完善	(169)
一、学者、作家相得益彰	(170)
二、成就杰出的理工科专家	(174)
第五节 招生与学业完成情况	(177)
一、招生情况	(177)
二、学业完成与就业情况	(179)
第六节 教学与科研成绩斐然	(185)
一、教学内容充实,方法灵活	(185)
二、潜心治学,成果卓著	(189)
第七节 活跃的校园社团及各类活动	(193)
一、学术演讲与学术社团的活动	(193)
二、文艺社团的成立与文体活动的开展	(196)
第八节 抗日救亡运动	(199)
一、抗日救国 据理力争	(199)
二、成立民先队部开展救亡活动	(201)

第五章 沦陷期青岛高等教育的断裂(1937—1945年)	(203)
第一节 强寇入侵,山东大学在“迁校”中沦亡	(206)
第二节 “东亚医科学院”的依稀状貌	(209)
第六章 抗战胜利后青岛高等教育名校传统的复兴 (1946—1949年)	(216)
第一节 国立山东大学胜利复校	(217)
一、高起点组建师资队伍	(217)
二、据理力争收复校舍	(219)
三、院系设置与人事安排	(223)
四、严格标准全国招生	(225)
五、撙节开支艰苦创业	(227)
六、半年筹备按期开学	(228)
第二节 教学科研及体育工作	(230)
一、学制与课程	(230)
二、科学研究	(231)
三、体育工作	(232)
第三节 系科特色与新系建设	(234)
一、中国文学系	(234)
二、物理学系	(240)
三、水产学系	(243)
四、农艺系	(244)
五、园艺系	(245)
六、地质矿物学系	(246)
七、医学院及附设医院	(247)
第四节 蓬勃开展的进步社团活动	(250)
第五节 作出历史贡献的爱国学生运动	(254)
一、三次反美怒潮	(256)
二、“六·二”运动	(258)
三、反“特刑庭”斗争	(262)
四、反对南迁,坚决护校	(263)

五、学生入学及毕业人数统计	(266)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68)
后 记	(271)

前 言

作为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分支,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和撰述,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熊明安、刘一凡、潘懋元、曲士培、郑登云、余立、涂又光、霍益萍、陈学飞、郝维谦、龙正中等先生的研究成果,陆续以皇皇巨著面世,诸多新颖的论文,也相继出现,显示出方兴未艾的良好势头。与这类专题史的发展几乎同时,各大学的校史研究,也此起彼伏热情一直不减。有的名校,专门建立了校史馆,专事该领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有的已经编撰出版了繁简不一的校史著作,缕述着自己学校的发展历史与建校经验,为自己的著名校长和教授评功立传。但是,把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地域教育的发展融为一体,撰写出科学、系统、翔实、可信的区域高等教育史,使之既不同于通史的概揽全局但疏于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具体而详尽的描述,又不同于某一大学校史的仅仅局限于一校范围,难以归纳出更为系统、更具有历史感、地域感的规律性内涵,除去《山东高等教育史》外,还未见有更多的建树。因此,这无疑属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一个有待突破的新领域。正是从这样的学术期待出发,我们开始了自己艰难的探索。本书就是这种探索的初步成果。

青岛是一个中等城市,从一个小小渔村发展而来,开埠也不过百年。其地位和影响,当然不能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具有厚重显赫历史的通都大邑相媲美,在历史时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上,也无法与南京、重庆、桂林、昆明、延安等相提并论;但是,作为中国较早形成的沿海开放城市,因为地缘的优越与气候的佳胜以及民风民俗的醇厚质朴,又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有着名校建设、名师传承的独特的高等教育传统。以我们长期工作、生活着的青岛近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为研究中心,撰写一部蕴含着我们对这方水土的依依深情的高等教育史著,正是当代青岛高等教育工作者无可推辞的义务和职责!这是一种理智与学术的选择,也是一种情感与责任的聚焦。

本书的撰述,就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开展。

其实,青岛高等教育的梳理、研究,早已是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与公举。不少研究成果,或探讨一时一事的始末,或考证某人某校的源流,大都具有筚路蓝缕、垦辟拓荒的意义,值得大家共同首肯与敬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成果还缺乏整合,还没有来得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给以系统的梳理与定位,某些历史资料,也有待于科学地发掘与论证。本书正是要在前辈和时贤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发掘、考证、整合、梳理、归纳、提升上下功夫,努力撰写出第一部系统描述青岛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与若干前辈、时贤的基础性成果相比,本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缕述如下,希望得到批评与帮助。

1. 中德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这是第一次正式入史。

2. 私立青岛大学的终结时间,本书依据可靠的史料,证明是在1929年,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928年。

3. 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师大图书馆新发掘出来的《国立青岛大学一览》、《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等原始材料,充实和丰富了既往的关于国立青大、国立山大的描述,使本书的第三、四、六章,具有自己的史料支撑,因而在学术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4. 沦陷期青岛的高等教育,一向被认为是一段空白,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语焉不详。本书第一次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中梳理清楚“东亚医科学院”的始末,使该校从连学校名称都众说纷纭的迷雾中走出,终于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历史界定。

5. 本书充分采用了北京、上海、南京、济南、青岛等地收藏的档案史料,力求所有言说,都尽量有足够的档案材料的支撑。在撰述过程中发掘整理出的档案材料,大都尽量保存在正文或附录中。我们相信,这本以史料的翔实与具体为主要特征的史著,会在当下尤其是日后的学术研究与史料考稽中略尽绵薄,发挥作用的。

我们的期许,是否符合实际,敬请读者诸君审阅本书的正文和附录。

刘增人

2008年春青岛大学

第一章 青岛高等教育体制的奠基： 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 学堂时期(1905—1924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伴随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开拓中国市场的进程,沿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解体,国家处于列强环伺蚕食鲸吞的危局中,新旧体制交替和中西方文化的撞击,成为引发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内容。和西方列强推行政治、军事强权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在介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抵抗远比军事上的抵抗强大而持久。清王朝统治末年,在外力入侵、国土日削的危势下,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抵抗,在教育领域中的现实,便是县学、书院、学塾等封建传统教育实体依然在近代社会的长期延续。

早在清政府在青岛驻兵设防之前,胶州湾的地理优势及丰饶物产已引起西方列强垂涎,“每艳称胶州湾为屯船第一善埠。”^①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斐迪南·封·李希霍芬(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上海欧美商会的资助下,开始了在中国山东的考察活动。1869年3—5月,李希霍芬用了3个月时间实地考察山东半岛,其考察过程和结论载入他于1882年出版的《中国》第2卷,内容涉及博山、章丘、潍县、坊子、济南、芝罘(今烟台)和青岛。上海欧美商会赋予他的考察使命是“全面探查这个封建帝国的矿位”。为此,他特别关注山东煤田和铁矿。李希霍芬认为,山东经济潜力巨大,其开发的制约因素是交通。他指出,山东煤田的唯一出口芝罘港,由于山脉环绕难以修建贯通产煤区的铁路,而胶州湾则是北中国最大和最好的港口,无愧于山东矿藏最合

^① 《许景澄条陈海军应办事宜折》,载袁荣叟总纂:《胶澳志 卷十一·艺文志·文存》,青岛华昌印刷局1928年12月版,第31页。

理的出口港之称。拥有大量煤田的山东的发展,取决于胶州湾的开放。如果选择青岛作为华北最大和最好的港口,将其作为与整个华北联系的起点,青岛将成为德国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重要的门户。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为激发德国对远东的军事野心并进而制定攫取胶州湾的殖民扩张政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1894年11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通过帝国宰相向外交部下达“向中国借让一个港口”,作为建造船坞和储煤站的指令。德国驻北京公使绅珂向柏林政府建议,位于山东半岛东南的胶州湾,尚未获得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应列为选港的第一方案。1896年8月,德国海军上将梯尔匹茨乘东亚舰队“皇帝号”抵胶州湾考察,向德皇威廉二世提交了有关胶州湾军事价值的考察报告和占领胶州湾的战略计划。随之德国外交部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胶州湾的要求,但遭到拒绝。1897年5月,德国海军部顾问、筑港工程师弗朗裘斯奉命抵胶州湾进行技术性调查。弗氏完成的调查报告,涉及胶州湾面积、岛屿、岸滩、气候、风向、海流、地质构造、工业交通现状与未来规划,以及港口商业价值与发展远景等内容,为德国舰队占领青岛提供了系统、完整、精确的数据。11月,巨野教案猝发,德国以此为借口,派远东舰队入侵胶州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胶州湾事件,开凭借武力“租借”中国沿海港口之先。翌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澳^①99年。殖民统治的建立,迫使青岛教育中断了沿袭封建教育体制惯性运动的链条,从此被纳入殖民教育体制之下。

德国侵占青岛以后,以种族、地域严格隔离的方式推行殖民地教育,先后创办了十余所教会学校,一所专供外国人子女就读的总督府学校,26所面向中国人的蒙养学堂和4所招收中国学徒的职业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先导,西方教育输入青岛租借地的过程,和中国传统体制的改革同步亦趋,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支配。相反,襁褓中的青岛现代教育是在中国教育划时代改革的大潮下催生的,是对新旧教育体制交替、转轨作出的积极回应,是在双重作用力下顺势而为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1905年以前殖民体制下的青岛教育发生的逆转,是对20世纪初

^① 青岛旧称胶澳。

中国教育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那么,1905年以后德国胶澳督署出台“独立的文化政策”,并把这一政策的实施框定为由中德双方在青岛创办一所高等学堂,进而把“商港与军事要塞并重”的城市定位上升到“样板殖民地城市”和“德国科学文化传播中心”,则是以中国教育大变革为契机,为德国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而展现的带理想主义色彩的进取姿态。在这一特定时空中的青岛高等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角色和中西合办高等教育的成功范例,对青岛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节 清朝末期和德国侵占初期的青岛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下的教育,青岛和全省全国一样,依然围绕科举考试这一轴心,循着封建教育的轨道循环运转,县学、书院、卫学、学塾为一体的封建教育体制在青岛近代社会依然延续。

19世纪末期,西方宗教传入青岛。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青岛的办学活动成为青岛现代教育的开篇。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后,以德国宗教组织为主的西方宗教组织先后在青岛开办了10所教会学校,以卫礼贤创办的礼贤书院和昆祚创办的德华书院影响最大。1898年,为使德国学龄儿童能在青岛当地就学,德国胶澳督署批准组建了一所专门招收德国学龄儿童的学校。1902年4月,总督府接管了这所学校,主要面向德国外交官员、驻军和商民子女,完全着眼于在华德国人子女完整地保持德意志的民族特征,学生最多时达300余名。

1901年,清政府诏令学制改革,青岛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公立小学堂——达材学堂。1905年,又颁诏废科举、兴新学。于是,胶澳租借地在封建教育体制改革和殖民教育体制初构的双重作用下,开始了现代教育体制的奠基。当时,由殖民当局给中国人设立的初等学校即蒙养学堂,共26所,多数是由私塾、村塾或义塾演变而来的新式学堂,兼有中外文理课程,成为承载现代教育的广泛基础。1907年,同盟会开始在青岛的办学活动,以学校为阵地,积蓄力量反清举义。陈干等同盟会会员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有志之士,蜂起加盟,争会震旦,后被胶澳督署关闭。以港口和铁路为布局轴心,青岛现代城市工业创始,使职业技术教育与城市工业对技术密集型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同步,船坞工艺厂徒工学校、铁路职工学校、农事试验厂附设学校和林务局附设学校等4

所职业学校先后开设,开全省职业教育之先河,造就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批技术工人。

一、县学、书院、卫学、学塾为一体的传统封建教育体制

县学,是官办教育的主体。因系县署官办学校且奉授儒学,又以“儒学”称之,加上“射圃”,合为学署。自宋代起,各县县治以内先后设立县学,历代袭之,讲堂斋舍屡有增建。至清代,设县学教谕、训导,负责教学和日常管理。县学学员统称生员,生员又分廩膳生员,简称廩生;增广生员,简称增生;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俗称秀才)。县学的一应教学行为均为生员参加岁、科两试取得乡试资格做准备。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宋明理学著作《大学衍成》、《性理》、《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综》和八股范文“时文”读本等。按县学规定,朔、望日生员须往射圃学射。县学建有严苛的学规,定期组织考试,为褒先掖后,还建有严格的升、降、责等奖罚制度。清初,县学额定廩生 20 名,增生 20 名,岁试和科试后多取进附生 15 名。县学虽为官办,待遇优厚,仕途畅达,但生员数额十分有限,居于官办学校主体地位在县学只能为少数生员赢得功名铺平道路,无法取代封建教育体制中的基础一环。

书院是科举取士的另一种教育场所,办学形式为官办、民营两种,其创设、分布和规模也比县学灵活。书院产生于唐末宋初,而青岛创设书院的时间可溯至东汉。汉灵帝中平五年(188),青州、徐州黄巾军复起,郑玄的门人数百人迁至不其山(今崂山铁骑山)。郑玄在不其山注经授徒,其授学方式颇似后之书院。后因粮食匮乏,郑玄解散诸生。郑玄当年在不其山设帐授徒处被称“康成书院”,该村名为“书院村”。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汉代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省高密市)人,东汉经学家,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郑学”。郑玄从小勤于学业,13岁能诵五经,18岁时做收赋税的低级小吏乡啬夫。后经北海太守杜密举荐,受业太学学习今文经,后又师从马融习古文经。郑玄学无常师,才兼百家,擅长博采众长,所以自成一代经学大师,42岁始授徒,从学者前后达万人。迁帐不其山时,年届62岁。郑玄一生,在授徒方面贡献卓著,三国时的名士崔琰、王经、国渊、任嘏等人,皆出其门下。他在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也颇有建树,著有《六艺论》、《驳五经异议》等,儒家十三经中的《诗经》、《周礼》、《仪礼》、《礼记》4

种皆作注释,为历代通用的经注善本。明代正德七年(1512),即墨知县高允中曾在书院故址建院舍,辟学田,重建康成书院。明代进士、即墨人蓝田的七律《三标山》中有“西邻书舍忆康成”之句,就是对郑康成学术贡献的缅怀。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平度改县设州,领昌邑、潍县,为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选址州城附近广设书院。自明正德三年(1508)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间,先后建有书院七处:太泉书院、状元书院、两山书院、台书院、潍阳书院、北海书院和胶东书院。所设书院均由官署捐廉俸,延聘名师,以经史为基,集众讲解,准备科举。清乾隆年平度知州王化南,于政事之余常亲往书院选讲经籍,以兴文教之风。

清乾隆十四年(1749),胶州知州周若炳为科举取士在胶州城水寨街西巷建珠山书院,后并入胶西书院。胶西书院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知州张玉树创办,同年,灵山书院创建。书院经费来自学田地租、捐款及利息。学生分童生、生员两类。入院须经考试,录取后由书院资助津贴。书院每月举行官课、私课各一次。官课由州官命题阅批,择优给奖。清道光十五年(1835)后,由于灵山书院、珠山书院的相继并入,胶西书院的从学人员越来越多,生员大多来自胶州各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兴新学,书院遂停办,改为胶州师范传习所。清乾隆五十年(1787),即墨县建书院一处,名为崂山书院,位于县治以东,由山长(书院主持人)一人总理其事。书院定期召集儒生在书院讲学、课考,研习经史子集,成一方文教之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县署改崂山书院为官立臬虞学堂,开创办学堂风气之先。

明朝初年,倭寇对中国沿海频繁入侵,掠杀人民,抢劫财物,危害日甚。明洪武二年(1369)至明永乐十四年(1416)40余年间,倭寇对山东沿海地区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侵扰,胶州湾周围的胶州、即墨、胶南等地屡遭劫掠。为抵御倭寇入侵,明朝在全国沿海设立卫所。自明洪武五年(1372)始,在胶州湾设立即墨及其所属灵山卫、鳌山卫、胶州所、夏河所、石臼所、雄崖所、浮山所及各巡检司,驻兵万余人为军屯的军户,兼务农渔,卫所教育始兴。

卫所教育,简称卫学,设在卫城、所城之内,面向军户子弟招生。卫城内设有学宫和文庙,灵山卫还曾设有书院,为卫学的执教场所。所城内设有学署,委派专人任教授,主持教务,经费所需,均由卫所官供。军户子弟入学后,教习儒学经典,操习武备,学成之后,按额定之数择优选送县学,成为廪生,从此步

入仕途。卫学享受选送县学的生员定额,非军户子弟不在选送定额之内。清雍正十三年(1735)卫所裁撤,鳌山卫所属的雄崖所和浮山所并入即墨县,卫学从此弛废,不能入县学者改从学塾教育。

清末时期的青岛教育,由于偏离农耕经济中心,地处山陬海隅,离县学、书院既远,大多数当地子弟只能依赖“学塾”教育。学塾是支撑传统教育的民间教育形式,是大量适龄子弟完成初级教育的基础形态。按设学的方式不同,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殷富人家延聘塾师在家教授子弟,称坐馆或教馆;一类是塾师在自己家里设馆授学,教习乡民子弟,称家塾或私塾;一类是由地方上或当地绅商捐助出资延聘塾师,在公众场所设塾施教,此类以乡镇居多,故称村塾或义塾。学塾教育视聘资多寡,或一人一塾师,或多人一塾师,授业效果也大不相同。一些村塾或义塾属于地方公益性质或乡绅义举,只不过跟先生认认字而已。正如《胶澳志》所载“胶澳教育在未辟租界以前,科举未废,学校未兴,关于文化事业,殊少概见。”^①

二、教会学校的创办

清同治十二年(1873),美国传教士郭显德来青岛进行传教活动,西方宗教势力开始进入青岛。清光绪十五年(1885),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即墨太祉庄设小学一处,开西方教会在青岛地区办学之先河。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后,以德国宗教势力为主的西方多教会派别先后在青岛开设小学、中学,这类学校初始多设在租借地内,后逐渐扩及山东各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基督教浸信会牧师谢万喜、张义集夫妇(美籍)在平度西关租用钦德堂为校舍,开办知务学堂,初设小学、初中两部,后增设师范班和高中班。1903年又开办义集女校,加设刺绣、缝纫等课。1898年,基督教信义会德国传教士昆祚在鲍岛山(今阳信路一带)开办德华中学,又称德华书院。该校设中学、小学两级,初有学生30人,后增至100多人。中学设德语、中文、几何、物理、历史、地理等课程,后增设师范班。该校主要培养传教士、洋行买办、教师和翻译人员,课程设置偏重德文和宗教学科。其学生来自青岛和山东内地,有的学生曾是科举成功者。德国胶澳总督府对来自该校的

^① 袁荣叟总纂:《胶澳志卷七·教育志》,青岛华昌印刷局,1928年12月版,第10页。

毕业生评价较高。

殖民文化的传扩,首先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下,当时不少中国人渴望通过教会学校“习洋务、晓新学”,因此教会学校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德国殖民当局从占领青岛起就根据兼顾与扶持优先的原则,大力支持教会办学,在土地资源紧缺的状况下,先后将几块较大的土地无偿捐给了教会,助推教会办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教会学校中规模最大、教育水平最高且历史最长的是礼贤书院,后称礼贤中学,1901年10月,由瑞士同善会出资,德国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R·Wilhelm)创办,卫礼贤自任监督,周铭九任校长。1902年,在胶州街(今胶州路)柏林会教堂旁建讲堂、宿舍。翌年,校址移往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有讲堂、宿舍数十间,招收学生60余人,增设高级德文班。除德文外,其余学科按清政府颁定的高等学堂所设课程授课。礼贤书院在卫礼贤的主持下,推行“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课程设德语、中文、科学和商业技能等。礼贤书院的教学计划,注重中西结合与学以致用,在巩固汉语和足够的德语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在算术和地理方面培养学生,在商业技术方面则着力培养学生在簿记、尺牍、算账、几何制图等一系列实际知识和实务技能,注重引导学生循序渐进,领悟后而入门。书院的学制为初级部3年,高级部4年。一些课程以德语为课堂用语。为了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条件,书院设法搜集形象化教具应用于课堂教学,并建立了化学和物理实验室,运用现代教育方法,编写适合教学的多种教材和中文教科书。1905年该校增设美懿书院,又名淑范学房,为青岛第一所招收女生的中学。卫礼贤依托礼贤书院建藏书楼,藏书3万余册,并创立尊孔文社,学生增至200人。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访问青岛时,曾亲临礼贤书院考察,对该校的教育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该校可派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权利。1904年,礼贤书院高级部学生谭玉峰去山东大学堂参加考试,因成绩优秀被选拔为优贡。礼贤书院由此而声名日隆,就学者益众。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校后,该校谭玉峰等6名毕业生选送至该学堂工科学习,并任学堂译书局翻译。

三、新式学堂初创

德国胶澳总督府的官办教育,首先是始建于1898年专为德国人子弟开设